

北美中國學期刊略述

吳琦幸

[提要] 北美的中國學期刊繼承歐洲漢學研究期刊的傳統，應因北美文化、經濟、政治戰略的需要，轉而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研究。由此匯聚了北美的學術研究團隊及學派，並創立了具有涵蓋政治、經濟、史學、社會學、文化、考據為一體的風格和廣泛研究領域的中國學期刊群。本文擬就北美中國學期刊的發展和演變，擇其要者加以評述，以彰顯其在世界中國學研究中的地位。

[關鍵詞] 北美 中國學 期刊 漢學

[中圖分類號] G239.1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6) 03 - 0112 - 12

近年來，有關海外中國學的研究^①在中國本土形成了一種新的熱點。這門發源於歐洲並基於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有關中國語言文字和文化研究的學科，在研究對象的本土形成某種新的趨勢，反映了這門學科所涵蓋的意義比其本身更為引人注意。通過海外的觀點來反饋有關中國政治、經濟、法律、語言、文化乃至文學、歷史等學科的研究現狀，成為崛起中的中國需要正視的內容。涵蓋了美國和加拿大的高等研究機構和學府的北美學界，曾經成功地從舊式的歐洲漢學（Sinology）轉化為中國學研究（Chinese Studies），而這個地區出版的有關學術期刊，成為這項區域研究的重要代表。今擇其要者敘之。

一、漢學一變而為中國學研究

北美的中國學研究從一開始就走了一條與歐洲漢學不同的路徑，儘管創始階段在相當程度上受到歐洲漢學的影響。如果說最初的歐洲漢學是在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化基礎上濃縮為專注文本研究的話，那麼北美的中國學從一開始就因應於新興的經濟、軍事、政治大國對於地球另一半的一個大國的綜合需求而形成。當然，古老的歐洲與年輕的美國在接受和研究一個古老的、外來的亞洲大國時都需要通過傳教士的穿梭往返帶回信息和文本，毫無例外地從最初的語言文字習得和研究開始，但是講究歷史傳統的歐洲，逐步形成了以中國學問作為研究對象，產生了“漢學”（Sinology）。該詞的前綴 Sino 是希臘語“中國”，後借為英語“中國”一詞的前綴。中文則取“漢學”為名。後雖然擴展為對中國歷史、地理、考古、政治、經濟等的研究，其漢學精神一以貫之。

最早的“漢學”在中國指用以整理校勘古籍文獻的一種朴學傳統，即為考據訓詁之學派。此種學派的治學方式與歐洲講究傳統的治學方式相契合。奠定歐洲漢學基礎的是 19 世紀中葉自中國回去的傳教士，如理雅各（James Legge）、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等，這批人回歐洲後帶回去很多關於中國的信息和資料，同時也帶去了他們的研究成果。^②在歐洲普及對古老東方的瞭解，繼而引起學者之興趣，循此進行語言學、音韻學、地理學、文學、歷史等領域的研究，故襲用“漢學”規劃此學科，由此奠定了歐洲老派漢學研究的基礎。

新興的美國面對著的是當代中國研究的急迫性，特別以社會、政治、經濟、歷史等學科為重，於是發展出新的中國學研究。一開始出於國家政治、經濟以及外交的需要，學者從地域研究的視角而並非以全球化的視野出發，用老派漢學的治學內容和方法進行研究，既有繼承也有揚棄。如果說歐洲漢學研究的對象類似對於一個精緻的花瓶之藝術年代和內涵的文化信息作為對象的話，那麼北美對中國的研究更像是對一個金礦的研究，從地貌、礦脈、河流和開礦的技術、運輸等方面綜合研究，其目的並非是欣賞黃金，而是需要立獲黃金所帶來的利潤。故有“美國的中國研究受惠於傳教與通商，也多出於實用的目的”之說。^③故此，美國的漢學研究在早期雖有語言文字等純學術性之考證，但是影響不大。1877 年，美國高校第一位中國語言及文學教授是耶魯大學聘請的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對漢學研究頗深，著有《簡易漢語課程》（*Easy Lessons in China*, 1842）等。據說他是當時北美唯一能說流利中文的美國人。^④但卻沒有學生報考學習漢語。哈佛大學則在兩年後聘請了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工作的安徽籍華人戈鯤化教中文，同樣門庭冷落。他的第一個學生是自己的英語老師。衛三畏與戈鯤化次年相見，事後衛三畏跟朋友說戈鯤化的學生比他的多一倍。因為戈鯤化有一個學生，而衛三畏根本沒有學生。^⑤戈鯤化在美國三年教學期間一共教了四五個學生，於 1882 年去世。^⑥即便在淘金時代華人最集中的地區加州，自 1890 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設置了中國語言文學的教席，直到 1896 年才請到了第一位中國語言文學教授傅蘭雅（John Fryer），同樣學生寥寥。

下列兩個重要事件吸引了更多的學者開始關注中國研究。19 世紀末，北美與中國的貿易通過太平洋商船進行得如火如荼，大批中國勞工從中國搭乘美國商船來到舊金山一帶淘金修鐵路，帶來了中國文化和傳統的直接傳播因子，由於貿易日益增加，雙方來往交流日益增多。但是加州居民對華人移民的態度從歡迎到排斥，導致加州州議會和美國國會有關華人移民的一系列排華法案通過，造成了相當大的反華排華的政治事件，引起美國學界和政界的關注，開始對於中國政治文化等進行各方面的研究，以提供文化傳統和政治背景。在二戰中，美國與中國同為盟國，最高決策者需要大量有關中國的資訊。緊接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美之間斷絕了外交來往，美國突然面對著一個無法瞭解的亞洲大國，更加刺激了對於中國研究的需求。

其次，質疑中國學研究局限在區域研究並與歐洲漢學作切割的關鍵性事件是 1960 年代。從國家層面來說，美國成為世界領袖，作為新的世界秩序的維持者，急需在全球擴展其實力，尤其需要在東亞地區擴張其國際影響，急於開拓當代中國的政經法及外交關係等全方位研究，並運用西方的方法例如人類學、社會學來探討中國的社會結構、地理條件、勞動力、自然資源等等。與老派歐洲漢學的切割成了勢所必然。1964 年，《亞洲研究學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組織了一批中國學研究學者進行有關漢學和中國學研究的概念、功能及範圍的探討，並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中國研究進行了全面評述，許多學者達成共識，認為傳統意義上的漢學研究特別是二戰之前的漢學已經不再適合新的時代，需要用更新後的中國學來代替。如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列

文森（Joseph R. Levenson）認為，“把無所不包的漢學當成一個專門研究領域”的看法是“早已過時的西方中心視角”的副產品，應改變這種傳統的研究方法。當然他不否定文本研究的重要性：研究漢語的文本是一個有用的方法，但中國研究必須進一步拓展其範圍。“漢學意味著文本的透徹研究確實是重要手段，但其弱項也在斯。”“僅僅是滿足精神上需要的文本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雖然忠實於文本和透徹瞭解其抽象意義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在文學方面瞭解其真實的對與不對的文本意義。”他認為老派漢學缺乏思想和理論深度，僅僅專注於文本研究和個體研究，已經不符合當代的需要。主張在各個主要系科中重視宏觀研究，並加大專業人才講授中國歷史、文化、哲學、社會、經濟等等。^⑦

這場討論對於區域研究進行的重新解釋，獲得了美國學者的共識。從此，以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哲學等學科的專題研究匯合為北美的中國學研究內容，並在大學中增加專門研究。從 1958～1970 年間，美國對於中國的研究增加力度，公私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等以及聯邦政府投入高達 4,100 萬美元的中國問題研究經費，在很多高校增加設置了中國研究中心或東亞研究中心（系所），遂使美國東亞研究機構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增，專業研究人員超越歐洲，中國學研究遂成為代替歐洲漢學研究的海外中心。

歐洲漢學一變而為中國學（Chinese Studies）。而中國學研究期刊也隨之進入了創辦的鼎盛時期。

二、中國學期刊開拓新域

學術期刊的功用是學者即時的研究成果和學科前沿動向的真實反映。因此，其創辦宗旨和追求的風格，也突顯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的實況。西方第一份漢學期刊誕生於荷蘭萊頓大學，由著名漢學家考狄創辦的《通報》（*T'oung Pao*, 1890），這也是該校設立這門學科廣招學生的年代。其時研究內容並非僅限於中國，而以東方學^⑧作為其研究範圍，但有關中國的論文為最多，集中在歷史、地理和語言文字考證等方面，“漢學”趣味十足，反映了《通報》在創辦初期的研究取向。僅以最早的 1891 年和 1892 年兩期的漢學文章與 2015 年第 3/4 期文章比較，可見一以貫之的歐洲漢學傳統。例如 G. Schlegel 的《論中文訓詁學中反訓的成因》（*On the Causes of Antiphrasis in Language*, 1891.2.4），C. De Harlez 的《孔子〈春秋〉和〈左傳〉中的中國宗教》（*La Religion Chinoise: Dans le Tchün-tsiu de Kong-tze et dans le Tso-tchuen*, 1892.3.3），書評則有《關於中國珠算的起源及其衍生於古老計算方法的研究》。再來看最新的 2015 年第 3/4 期：主要論文為麥安迪（Andrew Meyer）的《探索戰國史料中的一個範疇“子”的構建》（*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ategory in Warring States Sources*, 2015.3-4）、顧史考（Scott Cook）的《通過〈左傳〉和〈論語〉的透鏡看孔子》（*Confucius as Seen through the Lenses of the Zuo zhuan and Lunyu*, 2015.3-4）、柯馬丁（Martin Kern）的《〈史記〉中的“子”》（*The “Masters” in the Shiji*, 2015.3-4）。時隔百年，其傳統一脈相承。美國的《哈佛亞洲研究學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36）和英國的《亞洲研究雜誌》（*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41）繼承了《通報》的這種傳統，並反映了一些新的學科研究成果，例如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掘報告等。今天這三份刊物仍是世界漢學研究的重要學術期刊。

美國的中國學研究起步較晚，因此期刊創辦也稍晚，但發展速度和廣泛度卻遠遠超越了歐洲，尤以全方位對中國進行研究的學術取向，在學術期刊中全面地反映出來。由此而形成一股學

術合力，漸漸使中國學研究在近年來成為一門顯學，美國的各大學研究中國的論文超出海外所有國家。^⑨隨著論文數量之增加，中國學期刊在 1970 年代進入一個發展階段，很多後來成為頂級的中國學學術期刊都在這個時期誕生，促成了北美中國學從區域型研究轉向全球研究的大視野。

1975 年結束的越戰，對於美國的亞洲政策及中國學研究產生重要的影響。在前後達 20 年（1955～1975）的戰爭中，死傷數字激增為二戰之後的最高，對於這場戰爭的性質、合法性，全美輿論為之分裂，陷入紛爭。1968 年，反戰示威遊行已遍及全國各地。8 月，芝加哥的示威者和警察發生大規模衝突，造成流血事件。知識界反思這場戰爭導致的國內分化，對於亞洲的研究，迅速成為學者反思之內容。這對中國學研究來說同樣蘊釀著新的轉變。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中國學教授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回憶說：“1960 年代晚期，由於不為人知的原因，學生運動席捲全球。當然最關鍵的是 1968 年，正值巴黎事件爆發之時，美國的言論自由運動也導致了學生暴動，流血事件以及繼之而來的軍事管制。當時的加州州長里根命令軍隊開進加大校區，而伯克利加大的學生則力行抵抗。那是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對治中國歷史的學者來說感受尤深。”^⑩部分對美國亞洲政策及亞洲研究現狀強烈不滿的亞洲學會會員自發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成立“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該委員會發展迅速，不到 10 個月就擁有近 400 名會員和 600 多位《關心亞洲學者通訊》季刊的訂閱者；“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成立後，成員們對美國的亞洲研究，尤其是中國研究的現狀進行反思與批判。可以說，《關心亞洲學者通訊》是第一份促成此後重新認識和研究亞洲的刊物。該委員會的青年學者覺察到，“除極少數的美國外交政策專家以外，從事亞洲研究的學者和社會科學家在‘越戰’初期幾乎都對美國的越南政策緘默。”他們認為這些從事亞洲研究的學者和社會科學家之所以對美國政府的越南政策保持緘默，原因之一在於，“麥卡錫主義的傷害，使得學者們一直對捲入富有爭議的政治問題心有餘悸”。^⑪其深層原因為，二戰以來的美國亞洲研究完全服務於美國政府的內外政策，成為政府的實用工具。

這次大討論所引發的美國人對其價值體系、政治道德優越性的懷疑與反省，促使更多的學者反思在研究亞洲和中國時以西方作為救世主的主導取向和心態。學者愛德華·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和馬克·賽爾登（Mark Selden）指出，長期以來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界充斥著狹隘的種族主義偏見和殖民主義價值觀，“美國人是他們（中國）的救世主”成為了固定的思維模式。他們認為，很多問題都是全人類共同的問題，美國存在的問題同樣也是第三世界國家所面臨的問題。

“以相互學習為先決條件，我們可以從與世界主要文明的交流中學習到很多解決人類基本問題的有益經驗。實際上，無論任何民族都要通過鬥爭克服自己固有的局限性，這種鬥爭將為整個人類提供創造性和教誨。”因此，在從事中國問題研究時不可盲目的把歐美價值觀搬到中國，必須消除種族偏見，建立非殖民化的中國觀。^⑫以前所謂的區域研究，是有別於其他地區的特殊性的整合體。該概念原來自於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區域應用，以文化聚落和區域概念最為普遍。經過 20 多年的深入研究中國文化，這種觀念逐漸被揚棄，美國部分學者認識到“中國文明起源程序與世界上大多數非西方的古代文明的起源相似，但是與我們一向奉為主臬的西方社會科學所定的規律不相符合”，“換句話說，它使我們覺察到了一件重要的事實，即一般社會科學上所謂原理原則，都是從西方文明史的發展規律裡面歸納出來的。”^⑬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原理原則，僅僅應用西方社會科學作為事實依據是不夠的，必須要在中國史實的驗證下才能具有世界性。這為中國學研究的世界意義提供了例證。被年輕中國學家所激烈批判的主流中國學界，亦開始對其所持的西方中心論進行檢討反思。例如，中國學家費正清在 1969 年的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以《七十

年代的任務》為題發表演講時指出，“我們從西方角度提出問題，並收集證據加以回答，尋找我們所求索的東西，這樣做往往有忽視中國實際情況的危險。因此，我們會發現中國是典型的不發達國家——科學不發達，民族主義不發達，沒有建立議會民主，沒有工業化，沒有擴張等等。如果我們探討中國是為了尋找與我們的類似之處，我們幾乎可以看到一切停滯不前，一個‘靜止’的中國，因為它沒有像我們一樣變化。不幸的是，這是我們社會科學的一個內在傾向。”^⑭自此，美國的亞洲研究連同中國學研究進入了一個自覺的時代，無論從觀念和方法上都產生了一個新的突破。而反映這種突破的中國學期刊呈現出一種新的風格，那就是堅持學術的獨立性，擺脫以西方為中心的研究方式。^⑮

各大學的博士論文很多都把中國問題作為研究內容，據不完全統計，美國從 1891 年到 1913 年的中國研究博士論文僅為 18 篇，從 1914 年到 1944 年約有 480 篇，平均每年大約 15 篇，而從 1945 年二戰之後的有關中國的博士論文則出現了較大的增長，約有 2,685 篇，每年平均達 86 篇。1976 年到 1990 年的 15 年間，研究中國學的博士論文出現了井噴，達 4,849 篇，每年平均 323 篇。從 1991 年到 2007 年，更達到 15,000 篇，每年平均為 880 篇。^⑯撰寫論文的博士來源也有了很大變化，以漢語為母語的學者迅速增加，對於全方位地研究中國學提供絕佳的條件。這對於學術期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 1970 年代之後，美國的中國學研究期刊進入了鼎盛發展階段。

三、中國學期刊促進學科建設

1970 年代以後，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期刊開始與日俱增，到目前為止，北美創辦和發行大約有將近 40 種主要中國學期刊，這並不包括不定期的交流刊物。由於美國的出版發行制度不受限制，所謂的刊號和書號對於任何出版機構來說沒有定額的問題，甚至在中國視之為權威的 SSCI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評鑒系統，在美國也對所有的刊物公開。易言之，任何書刊雜誌的出版，都可以申請到書號和刊號，以及納入 SSCI 系統。^⑰因此不僅是美國的學術機構和高校可以編輯出版中國學學刊，任何有興趣的團體（含外國團體和機構）或個人都可以在美國出版有關中國學的期刊和專著。例如中文教師協會、留美中國歷史教師協會、美中國際交流協會等等，都可以自行編輯出版發行中國學研究期刊。甚至美國以外的中國本土學術機構和高校，也在美國編輯出版有關中國學研究的中英文學術期刊。

據筆者統計，美國的中國學期刊，約有下列三大類（為便於瞭解這些刊物，在被 SSCI 收錄的刊物旁，用 * 號做標誌）：

（一）美國學術機構和大學編輯出版的中國學研究期刊，佔總數約 90%

1. 綜合性期刊

《美國中國研究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85）半年刊，由美國中國研究協會主辦，側重於社會科學領域各學科的研究，其中以當代中國歷史和語言文化為主。

《中國研究書評》（*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A journal of reviews of scholarly literature in Chinese*, 1994）半年刊，由夏威夷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創辦編輯。海外中國研究中，書評作為一項重要的學術研究。此刊刊載中國研究各領域的書評，但以中國文學和文化為主，深度評論達 30 ~ 40 頁，是在中國研究領域中比較重要的書評雜誌。

《華盛頓當代中國雜誌》（*Washingt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 1992）半年刊。美中政策基金會編輯出版。側重發表中國當代事務的各個方面研究，尤以政治、經濟、軍事、環境等為主題。

此刊在當代研究中頗為重要。

2. 歷史類

《二十世紀中國》(*Twentieth-Century China*, 1975) 半年刊, 由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會(HSTCC)編輯, 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出版社出版。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會的會刊, 創辦之初側重中國民國史的研究, 近年來其涵蓋範圍則上伸到晚清, 向下擴展到中國當代研究。繼承了漢學考證為主的傳統。

《唐研究》(*T'ang Studies*, 1982) 年刊, 為唐代研究學會的會刊, 並由該學會編輯出版, 是斷代史研究的重要刊物。作為斷代史研究, 美國學界有不少類似的學刊, 均在 1970 年代之後創立, 唐代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種。此刊不僅在美國學界, 在世界漢學界也是值得推薦的學刊。

《近代中國》* (*Modern China*, 1975) 雙月刊, 有不少書刊譯為《現代中國》, 實為近代和當代中國研究最重要的學術刊物之一, 在學術界影響極大, 涵蓋的歷史從明清之際到現代中國的歷史及社會科學各領域, 尤重創新和開拓性之研究。由於斷代時間較長, 為近代到現當代的通史式研究, 但是在選擇課題時, 均從很小的論題出發, 尤見其學術扎實之風格。

《明史研究》(*Ming Studies*, 1975) 半年刊, 由美國明史學會編輯, 明尼蘇達大學現代史中心出版, 作為學會的會刊, 主要研究 14 世紀到 17 世紀的中國歷史。

《清史研究》(*Late Imperial China*, 1975) 半年刊, 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出版。斷代史研究的重要刊物, 全方位地以明清兩代歷史、文學、社會、經濟、政治、哲學、宗教以及藝術作為研究對象。

《宋遼金元》(*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1970) 年刊, 美國宋遼金元學會的會刊, 研究方式以傳統為主, 兼有邊疆國土研究的論文, 尤以這四個朝代的土地關係為特色。

《中國中古研究》* (*Early Medieval China*, 1994) 年刊, 由美國中國中古研究團體創辦編輯並出版, 是一份同仁性質的刊物。其斷代歷史從漢末到初唐, 涵蓋了中國歷史上的兩大皇朝的鼎盛時期以及轉折期。編輯部設在佛羅里達大學語言文學文化系。

《早期中國》(*Early China*, 1975) 年刊, 由美國早期中國學會和古代中國研究會聯合編輯,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出版(現轉移到香港中文大學), 是一份研究先秦到漢末的重要學術刊物。

《中國歷史評論》(*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987) 半年刊, 由留美歷史學家學會編輯出版。這個學會主要由中國大陸留美歷史教師組成, 此為該協會會刊, 論文涵蓋歷史的所有領域, 包括書評。會址在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Cal State LA)。

《美中社會和文化》(*American-Chinese Society & Culture*, 1998) 年刊, 由哈佛大學的一些社會和人文學科的訪問學者及其他大學華裔學者創辦, 中英文合刊。由美中文化研究所編輯出版。論文涉及中美關係、政治、經濟、文學、歷史等方面。中美兩地發行, 具有一定影響。

3. 社會科學, 含政治、經濟、法律、外交等

《中國聚焦》(*China In Focus*, 2005) 半月刊, 由亞洲美國促進會編輯出版, 2006 年停刊。其內容以報道亞洲和中國的事件為主, 兼有評論。

《中國人權論壇》(*China Rights Forum*, 1990) 季刊, 由美國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編輯出版。

《中國安全》(*China Security*, 2003) 季刊, 由美國的智庫世界安全研究所編輯出版, 該所

分析世界的各國安全和國際關係，此刊主要針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國際關係。

《中國商業史》(*Chinese Business History Bulletin*, 1990) 半年刊，由美國的中國商業史研究團體編輯出版，專業刊登中國商業及歷史的學術研究文章和會議報告，具有大量的信息和動態。

《中國公共管理評論》(*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2) 季刊，由美國公共管理協會中國分會編輯，羅格斯大學國家公共生產力中心出版，為該會會刊。刊載有關中國的行政改革、公共政策、行政法、公共工作效率等學術文章。

《中國公共事務季刊》(*Chinese Public Affairs Quarterly*, 2004)，由美國中國公共事務學會編輯出版，專門發表有關中國公共事務領域的學術論文。

《哈佛中國評論》(*Harvard China Review*, 1998) 季刊，由哈佛中國論壇、劍橋中國研究所編輯出版，刊載哈佛大學文科專業的博士、碩士和本科生有關中國研究的學術期刊，每期圍繞一個有關中國的主題進行討論，並以中英文兩種文字同時出版發行，免費贈送。

《中國旅遊研究》(*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2005) 季刊，由勞特里奇出版社出版，中英文合刊的中國旅遊研究期刊，內容涵蓋中國大陸、香港、台灣。

《中國政治學刊》*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995) 季刊，美國中國政治研究學會會刊，集中於中國政治理論、政策和實證研究。

《耶魯—中國衛生雜誌》(*Yale-China Health Journal*, 2002) 年刊，由耶魯—中國協會編輯出版，專門刊載有關中國公共衛生研究及報道。

4. 人文學科

《中國語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73) 半年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創刊，主編王士元，為普通語言學和中國語言學相結合的國際性專業研究期刊，涵蓋普通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現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東亞語言學報》*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992) 季刊，由語言學家黃正德主編並創刊。是重要的中國語言和語言學期刊，該刊還刊登日語、韓語等東亞語言的理論研究。

《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84) 半年刊。編輯和出版由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及中國研究所，是介紹和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最專業的期刊，尤其是改名前的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84 ~ 1998) 時期，該刊再往前可追溯到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 (1975 ~ 1981) 時期。除文學研究以外，也涵蓋電影、流行文化、表演、視覺藝術、建築等。這份期刊對於美國“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建立影響巨大，意義深遠。

《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77) 唯一專門討論中國文學的西語年刊。由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耶魯大學、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資助出版，每期包括五到七篇從古典到現代各類文學的論文以及同樣數目的書評。當代文學方面的評論和研究文章約佔20%。

《中國音樂研究會簡報》(*ACMR Newsletter*, 1988) 年刊，由中國音樂研究會編輯出版，也是該會的會刊。

《中國音樂》(*Chinese Music*, 1978) 季刊，北美洲中國音樂研究會會刊，是這一領域中的權威學術期刊，涵蓋中國音樂的各個方面。

《中國演唱文藝》(*CHINOPERL: Journal of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 1969)

半年刊，由俄亥俄州立大學編輯出版。這是一份獨特的研究中國戲劇文學藝術的刊物，重點在於口頭文學和說唱藝術。

《道教研究雜誌》（*Journal of Daoist Studies*, 2008）年刊，道教研究的專業雜誌，包括學術文章、當代道教活動和相關信息。

《中文教師學會學報》（*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Association*, 1966），一年三期，為美國中文教師學會會刊，刊載有關漢語語言教學、語言學和中國文學的研究論文及書評。中英文論文均有。

此外，尚有中國學術機構在美國設立的編輯機構合作出版的中國學術論文翻譯文章，嚴格說來，這是中國出版物，反映的是中國研究各個領域的觀點和資料，但是由美國出版，可以說是中國本身的中國學期刊，有下列數種：

（二）中國高校在美國聯合編輯出版的中國學期刊

《中國傳媒研究》（*China Media Research*, 2005），由美國中國傳媒研究會編輯，並由紐約一家自費的馬斯蘭德出版社（*Marsland Press*）出版。^⑩這是中國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與傳媒研究會合作在美國出版的代表中國觀點的刊物。據該雜誌主編稱，其主旨是讓世界注意中國傳媒研究，也讓中國瞭解世界傳媒研究。

（三）翻譯中國本土學者研究成果的期刊

《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1968），由夏普出版社（*M. E Sharpe*）出版，^⑪編譯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等地出版的中文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論文。

《當代中國思想》（*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1997），夏普出版社出版的編譯中國出版的思想類論文。

《中國經濟》（*Chinese Economy*, 1967）雙月刊，由夏普出版社出版，刊登中國的中文經濟學文章的英譯，也有國外學者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文章。

《中國法律與政府》（*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1968）雙月刊，由夏普出版社出版的翻譯中國有關政治和政府的學術文章，以及中國法律和國家政策的文獻。

四、如何評價美國中國學期刊影響力？

任何一份學術期刊，都只有在學術界中引用和討論商榷才能放大其功能。如何對學術期刊進行評價？這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衡量一個學術期刊的質量，通過引用率和專家組成的評鑒委員會進行各領域的學科排名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以其在社會和學術界的影響力而定，而不僅僅按照數據來評估。即便是數據的話，當今的學術評價也已引進了不同的系統，其中一個比較普遍的是 SSCI，引用率的高低決定了學術流通的頻率，是一種影響力的指標，但並非評價學術期刊水平高低的唯一標準。綜上所述，美國的中國學學術期刊只有很少一部分列入 SSCI 系統，甚至具有悠久傳統的、在學界具有很大影響力的《通報》、《哈佛亞洲研究學報》、《亞洲研究》、《早期中國》、《中國文學》等都沒有進入這個系統。捆綁並絕對化這個系統，是對評價體系的誤解。事實上，國際上對於社會科學期刊和自然科學期刊都有多樣的評價標準，形成了不同的體系。例如英國劍橋的影響因子評價標準（*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澳大利亞的亞洲研究協會的 ASAA 評價標準，以及西班牙格林納達大學的 SJR 等等，都是權威的中國學研究期刊評價系統，影響甚大。當然美國的 SSCI，已經成為世界最常用的社會科學和

自然科學的引用率評價標準。對所有的評價體系，不應該盲從，主要是看學術期刊反映的學術成果的尖銳、前沿和奠基作用。

如果換一種角度來看學術期刊的影響力，我僅舉下列三份美國的中國學期刊為例，以看出期刊在中國學研究方面的作用。

1. 《早期中國》（*Early China*）——一門學科的誕生

從學術發展來說，一門新學科的建立，往往在積累大量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提出理論架構和領域，並得到學界的廣泛承認。如果一種期刊的影響力可以促成一門新學科的誕生，我認為該期刊就具有填補空白的作用，是任何引用率和影響因子都無法評價的。我將《早期中國》（*Early China*, 1975）來作為一種分析的例證。這份刊物的創辦，不僅使美國的古史研究成為繼歐洲之後最重要的學科，更重要的事是促使早期中國研究（*Early China Study*）這門學科的誕生。

中國的歷史研究，傳統上以朝代作為斷代的縱向研究，沿襲獨一無二的綜合性文獻史料《二十四史》作為敘事結構。習慣上將秦、漢斷代，秦以前則為先秦，西周和東周處於文獻學的最早年代，周以前則為夏商兩代。殷墟甲骨的發現，使商代成為有文獻可證的年代。海外的漢學研究或中國學研究，也參照中國本土研究歷史的方法，將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以斷代方式進行學科分類，按照朝代來研究並設置學科。秦漢有的時候並稱，有的時候分開研究。魏晉南北朝斷代，作為中古期。然後依次為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美國高校中的中國古代歷史研究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學術資源相比，有天壤之別，尤其是先秦或商周史研究，一向被學者指為聊無生氣、人數寥寥無幾的研究領域。這門由歐洲漢學家開創的學科所使用的資料無非是《十三經注疏》或《二十四史》的文獻資料，與中國本土歷史學者使用甲骨、金文和其他考古材料相比，無論是文字功力和經典解讀都無法匹敵。美國學術界極重師承，所謂的“支援意識”在美國的歷史、哲學、文學等各科的師生學業傳授和專業發展都非常普及。由於當時中國歷史的研究重鎮是哈佛，導師費正清執中國學研究之牛耳，培養了一大批學術人才，20世紀中期的美國大多數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均出自費正清門下。但費正清專長為現代中國的研究，重點在於研究社會與制度史的研究，對於古代研究尤其是文獻性的研究缺少實質性的興趣。在一個講究傳統、遵循支援意識的美國學界，先秦這一門學科始終沒有興盛起來。

《早期中國》的創辦者、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歷史系教授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曾在紐約大學獲得歐洲現代史的碩士學位。獲碩士學位後，1962年重入學府，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學習漢語並開始將視野轉到了古代中國。1969年，他以《古代中國的公共勞動：商和西周的強制勞動研究》（*Public Work in Ancient China: A Study of Forced Labor in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為論文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受聘於加州大學任教。此後他一直致力於有關中國古代歷史文化方面的研究。1975年，他創辦《早期中國》這份具有歷史開創性的學術刊物。在他以前，學界很少使用“早期中國”這個概念來指稱從史前時代到商周秦漢連續四代的時期，“早期中國”的概念隨著這份學術刊物的誕生而誕生，吉德煒並創辦了早期中國研究學會（*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吉德煒在為《早期中國》創刊所寫的導語中說到：“《早期中國》是一份致力於在中國的史前時代、商代、周代以及漢代等領域傳播的信息和試探新思想的研究通訊。它是早期中國研究學會的通訊，這個學會在1975年3月成為中國先漢研究學會的繼承者。《早期中國》比之前的‘先漢研究通訊’的範圍更廣。它將包括漢代研究，並且在其現行的常規部分列舉的正在寫作的著作外，它還將包括一些短文和研究文章。”^②這門學科的範圍起於史前、殷

商，終於漢代之末。這正符合中國文字從最早的考古材料到甲骨文、金文、大小篆字，及於漢代的隸定、正楷，其書寫載體的成熟，到紙的發明並應用。這對於當時的先漢研究會以及這一門學科的教授是一種新的嘗試，意味著“早期中國”這個概念將包括漢代，而並非是漢代之前。同時，吉德煒提出這個概念還有教學的實用角度，他認為“早期中國研究一方面體現在研究和著作上，另一方面則體現在教學上，前者一片繁榮，後者則並非如此，我們中的一些同事丟掉了或正在丟掉教學職位，而其他的則找不到教職。……如果我們應該帶著同情和深度來瞭解現代中國，那麼它的古代歷史同樣不可被忽視。早期中國研究在現代課程中有其合法地位，我們必須確保它的價值被認識到。”^②

吉德煒的這一宣言也確定了“早期中國”作為一門專業在美國高校的中國學研究課程中開始設置。《早期中國》的創刊以及他此後的努力使這門學科開始受到美國中國學學者的重視，一流的學術論文在這個刊物上發揮影響力。經過了40年的學術耕耘，“早期中國”在美國高校中成為佔有最大比例的漢學課程。目前，在美國的主要研究性高校中至少有一位“早期中國”研究的教授職位，在一些學科中，例如思想史特別是考古學，“早期中國”的學者顯然佔了漢學研究中的最大比例。甚至今天在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中，主要集中在兩大歷史段，早期中國和宋至近代。這種分期法來自於吉德煒的創意以及持續不斷的《早期中國》學刊的耕耘。

2. 《近代中國》（*Modern China*）——一個學派的形成

如果一個刊物的創立能夠促進一個學派，那麼這份刊物的學術價值功莫大焉。我認為由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創辦的《近代中國》可以達到這個目標。早在1975年創刊之初，創始人之一黃宗智就為該刊定中文名《近代中國》，似有與《早期中國》異曲同工之妙，即稍稍擴大中國“現代”的概念，事實也證明了創刊者的遠見，這份刊物並不僅局限於中國的現代，而將清朝囊括其中是非常正確的，使其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近代和現當代中國歷史、經濟、政治、法學的學術期刊。該刊重視創新和開拓性的方法及其研究，關注的常常是重要的學術檔案，用材料來說話。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科中，如此重視檔案（文獻）的研究方法是罕見的。這種方法直接與中國的朴學傳統相接續。在該刊所發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在研究方法上，黃宗智一直堅持從最基本的經驗和實踐事實出發，去尋找最重要的理論概念，而不是從“先驗”的理論出發去“規範”經驗。他認為，只有通過經驗與理論之間的反復連接，才能真正認識到社會經濟現象的真實狀況，進而發現那些由理論推演出的“規範信念”與經驗事實的相悖之處；而學習和掌握各流派的理論，目的不是將其作為“真理”，而是要與這些理論對話，從而幫助自己提煉最符合現實的概念——這些概念仍需要再返回經驗加以檢驗其有效性。

今試舉一例：過去西方學者、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對清代法律制度的研究，一方面，主要是著眼於清代法律的表達（這一表達體現在成文律例、牧令手冊、判牘彙編之類的文獻資料之中），另一方面，雖然也不乏對某些具體案件的分析，但被利用的案件數量往往非常有限，缺乏立足於更廣泛的案件之上對具體司法實踐所作的深入分析。在《近代中國》發表的文章中，該刊倡導以地方訴訟檔案作為主要的研究材料，通過挖掘這些檔案所包含的豐富信息，展現清代基層司法運作細膩而立體的過程。美國學者率先大量地利用這些檔案進行清朝法律史研究，此刊物居功至偉。最近也有少數幾位中國大陸學者開始使用司法檔案研究清代法律。這種向檔案研究的轉變雖然始於美國學者包恒，但真正將清朝檔案介紹給美國學術界並建立起立足於堅實檔案研究的，即為黃宗智，體現他研究思想的《近代中國》期刊，在這方面發表了相當大量的研究文章。正是在他的

帶動下，他的學生接受了這種方法，前後形成了一個團隊，如今已經成為這方面的重要學者，開創了學界所謂的中國法律史 UCLA 學派。

3. 《中國語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主流語言學理論的集結地

前文所述的西方社會科學中心論，是西方學者以其“西方的視角”對中國文化進行俯瞰而進行的區域研究。同樣，中國學者也常常會走向另一端，那就是自古以來以為是世界的中心，西方有的，中國都有，只要研究中國就夠了。無論是史學、文學、社會學、哲學等都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似乎很少出現過研究西方學術的大師級人物。唯一的例外是語言學。中國擁有著世界上最為複雜的語言生態環境和獨特的符號系統。建立在西方語言實踐上的語言學理論，在面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獨特性和複雜性的時候，碰到的巨大困難就是完全陌生的系統。這也是早期漢學家被獨特優美而困難的漢語及所屬的文字、音韻、方言等吸引得如癡如醉，以至於終身樂於此的原因之一。因此，語言學理論缺少了中國語言的研究，就無法稱之為完整的解釋系統。而中國的語言學者如趙元任、李方桂、王士元等，在熟曉西方語言學理論的基礎上，以漢語作為研究對象提出的理論在西方的專業著作常被引用，並當之無愧地成為世界性的語言學家。由王士元 1973 年創辦和主編的《中國語言學報》，更使這門學科在主流語言學科中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這份學刊遂成為普通語言學和中國語言學相結合的國際性專業研究期刊，涵蓋了普通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尤其注重跨學科的研究，融匯歷史、文化、社會、心理學於一體，並用計算機科學實驗來證明語言學理論。當時創辦這個國際唯一的漢語語言學報的時候，得到了漢語語言學之父趙元任的指導和關心，該刊的創刊號即獻給趙元任先生。此後，該刊在王士元、李方桂、曾志郎等著名語言學家的參與之下，成為國際漢語語言學研究的權威雜誌，其影響之廣泛並非僅限於漢語語言學界，而及於世界語言學界，其領域也非僅止於語言，在計算機與漢語的人機翻譯和對話方面，有比較前沿的研究。王士元本人則以創立著名的“詞匯擴散理論”而在國際語言學界享有盛譽，此理論在學報中首先披露，以其漢語語言學理論顛覆某些主流語言學理論。

當計算機普及之前，對於中文信息處理的前景以及未來的人機對話，在語言學界產生了相當大的迷惑。語言學者急需對此提出指導性的理論，正是這份雜誌在人機對話、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等方面，發表了有關論文，使中文信息處理、漢字認知等學科都有超前的世界一流研究。

王士元對語言學理論的發展有一個這樣的展望：“現代語言學從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1786 年的講演開始。此後語言學最精彩的發展，都是在歐洲。比方 Schleicher、Brugmann、Verner 這些偉大的語言學家都在歐洲。所以我們可以說 19 世紀的語言學基本是在歐洲，歐洲領先的。20 世紀呢，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像 Leonard Bloomfield、Edward Sapir、Joseph Greenberg，以及從俄國去美國的 Roman Jakobson。先是結構語言學，又是生成語言學等等。基本上 20 世紀是美國領先。所以我一直最大的願望，就是 19 世紀是歐洲，20 世紀是美國，21 世紀來到中國。”^②這是當代最優秀的語言學家對語言學研究的期許，也是對中國學研究的期待。

①中國近來不少大學相繼成立中國學（或漢學）研究中心。中國學研究本是海外指稱研究中國的學問，如在中國設立相同名稱的研究中心，此項研究成為區域性研究，似有不妥。以“海外中國學”或“海外漢

學”為宜。

②理雅各 1861～1872 年出版英譯本《中國經書》（*The Chinese Classics*）五卷。包括《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書經》、《詩經》及

《春秋左傳》。1870 年完成《十三經》英譯。衛禮賢在 20 世紀初將《論語》、《道德經》、《列子》、《莊子》、《孟子》、《易經》、《呂氏春秋》、《禮記》等譯成德文。

③許偉雲：《北美中國學研究·序》，《北美中國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第 3 頁。

④ Stephen R. Platt, *The Mandarin of Cambridge*, *Yale Review*, 92: 1 (2004): pp. 85-103. 衛三畏有多種漢語研究專著，如《官方方言中的英漢用詞》(*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rect*, 1844)、《中國地志》(*A Chinese Topography*, 1844)、《中國商業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1844)、《英華分韻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anton Dialect*, 1856)、《漢英拼音字典》(*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4) 等。最有成就的一部著作為《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 1848)

⑤ Stephen R. Platt, *The Mandarin of Cambridge*, *Yale Review*, 98: 1 (2004): pp. 85-103.

⑥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1882.

⑦ Joseph R. Levenson, *The Humanistic Disciplines: Will Sinology Do?*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1963-64), pp. 507-512.

⑧這裡所用的東方學並非是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之含義，而泛指亞洲和太平洋一帶的文化歷史。英語 Oriental 一詞曾含混地指稱來自亞洲及太平洋島國的人士，在 18 到 19 世紀的北美含歧視之意。2009 年，美國聯邦眾議員 Grace Meng (孟昭文)、Ed. Royce 提出了在美國的法律文件中取消使用這個不敬的名詞，而以“Asian American”代替。當年 9 月 9 日，獲紐約州眾議員通過。City New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 2009.

⑨美國大學學報和各學會的學術期刊，在這一段時間中發展迅速。本文所列的重要學術期刊，大部分出自此時。

⑩鄒羽採訪記錄，徐有威整理：《我們這一代漢學家——魏斐德教授訪談錄》，上海：《史林》，2008 年第 4 期。

⑪⑫⑬ Edward Friedman and Mark Selden (eds.), *America's Asia: Dissenting Essays on Asian-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 p. 77, XV, XV.

⑭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編：《現代史學的挑戰——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演說集 1961 ~ 1988》，王建華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⑮吳原元：《20 世紀 60 年代末以來美國中國學的新走向》，上海：《歷史教學問題》，2007 年第 2 期。

⑯楊濤：《美國產生的中國學博士論文：文獻資源概述和目錄學之研究》，《北美中國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第 897 頁。

⑰當然這個申請系統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期間需要相當繁複的程序以及認證手續。詳見 <http://ipsience.thomsonreuters.com/contact>

⑱這是一個由旅美華人 2003 年註冊成立的自費出版社，對於書刊論文的學術質量不論。自辦《自然與科學》被稱為山寨版。參見《中國青年報》，《人民網》報道，<http://media.people.com.cn/BIG5/40710/15376139.html>

⑲該出版社 1958 年成立，專門出版自俄文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翻譯的英文書籍，後擴大到歐洲語言及日語的翻譯文獻。近年來也翻譯出版中文社科和人文書籍雜誌。

⑳㉑ Editorial Statement, *Early China*, Vol. 1 (FALL 1975), pp. i-ii.

㉒ Virginia Yip (葉彩燕), Stephen Matthews, Report: The Childhood Bilingualism Research Cent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38 (2010-1).

作者簡介：吳琦幸，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聖地亞哥分校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客座教授。

〔責任編輯 劉澤生〕